

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

章开沅 主编

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章开沅,马敏主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

ISBN 7-5351-2299-X

I. 社… II. ①章… ②马… III. 教会学校:高等学校-研究-中国-近代-文集 IV. G52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6223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汉口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电话:85830435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印刷

(430035·古田路 10 号)

开本:850mm×1168mm 1/32

4 插页 15.5 印张

版次: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383 千字

印数:1—2 000

ISBN 7-5351-2299-X/G·1878

定价:24.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主 编 章开沅 马 敏

编辑委员会 章开沅 马 敏 王奇生
周洪宇 何建明 史静寰
陶飞亚 徐以骅 刘家峰

目 录

贝德士文献的史料价值	章开沅	(1)
马希曼、拉沙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马 敏	(2)
中学与西学		
——作为西学输入渠道的圣约翰大学	徐以骅	(29)
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中国文化教育	何建明	(46)
院系调整之前：齐鲁大学教授状况的分析	陶飞亚	(68)
齐鲁大学经费来源与学校发展：1904—1952	刘家峰	(81)
试论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中西文化观	王立新	(131)
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论基督教及其教育	史静寰	(149)
近代中国基督教神学教育的历史考察	余子侠	(179)
《万国公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析	杨代春	(206)
清季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交往史论(1885—1905)	秦和平	(237)
从传教士到考古学家		
——明义士传略	方 辉	(265)
上海震旦大学(1903—1952)	(美)乔恩·W·亨勃尼著 郭太风译	(288)
瑞典行道会在湖北六十年记	(瑞典)Fredrik Jonsson 著 刘家峰译 马 敏校	(303)
不为人知的华人传教士：		
——巴塞尔教会的中国传教士(1847—1866)	(美)杰西·G·卢茨、罗兰·R·卢茨著 李亚丹译	(312)
中国教会大学学报校刊出版史略	王奇生	(337)

中国基督徒名录.....	贝德士辑	(369)
《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会论文集》简介.....		(487)

Contents

Historical Values of Bates Paper	Zhang Kaiyuan(1)
J. Marshman, J. Lارسا and Early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Ma Min(9)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Knowledge: A Case Study on St. John's Univ. as a Channel of Western Knowledge	Xu Yihua(29)
Educ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t St. John's Univ	He Jianming(46)
An Analysis of Professors of Cheeloo University Before the Ad- justment of Colleges and Departments	Tao Feiya(68)
Cheeloo Univ. 's Fund Sources and Development: 1904—1952	Liu Jiafeng(81)
A Study on Y. J. Allen's View of China and West	Wang Lixin(131)
Chen Du xiu, Li Dazhao and Yun Daiying's Views on Christianity and Christian Education	Shi Jinghuan(149)
A Historical Study on Theological Education of Christianity in Modern China	Yu Zixia(179)
The View of Wan Kuoh Kung Pao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 ture	Yang Daichun(206)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Qing Dynasty's Communication with the Vatican	Qin Heping(237)
From Missionary to Archaeologist: A Brief Biography of Dr. Me-	

nies	Fang Hui(265)
L'Universite L'Aurore, Shanghai, 1903—1952	
.....	Jon W. Huebner(288)
Sixty Years in Hubei—Swedish Mission along Changjiang ...	
.....	Fredrik Jonsson(303)
The Invisible China Missionaries; The Basel Mission's Chinese Evangelists, 1847—1866	
.....	Jessie G. and Rlland Ray Lutz(312)
A Brief History of Christian College Journals in China	
.....	Wang Qisheng(337)
A List of Chinese Prominant Christians	
.....	edited by M. S. Bates(369)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A Collection of Theses at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the Documents of Chinese Christian Colleges"	
.....	(487)

贝德士文献的史料价值

章开沅

贝德士文献 (Bates Papers) 共 131 盒 (box), 1162 卷, 现收藏于美国康州纽黑文 (New Haven)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Special Collections), 卷帙浩繁, 内容丰富, 是不可多得的现代宝贵史料。

贝德士 (Dr. Miner Searle Bates, 1897—1978) 是美国传教士, 曾获牛津大学硕士、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均属历史学专业)。1920 年来华, 在金陵大学历史系任教达 30 年。1950 年离华返美, 在纽约协和神学院讲授教会史相关课程, 1965 年退休后, 长期从事《新教徒在中国社会, 1890—1950》这一巨著的撰述工作, 惜因病猝逝, 未能终篇。

抗日战争爆发后, 金陵大学西迁成都。贝德士奉陈裕光校长之命, 以副校长名义留在南京负责守护校产, 直至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贝德士是南京大屠杀最重要的外籍目击者之一。因为他曾先后参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Nanking Safety Zone) 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Nank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Committee) 的筹建并长期亲自主持金大校区的救援工作。1939 年 5 月以后他还担任委员会的主席, 亦即最后一任主席, 所以两个委员会的档案文献大多由他保管, 1950 年返美时全部携回。

据我初步检阅所得, 与南京大屠杀直接有关的资料, 集中保存于贝德士文献第 4 盒之第 52、59、63、65、67 卷, 第 102 盒之

第 861—871 卷，第 126 盒之第 1137 卷。

第 52 卷主要是贝德士与友人及家人在 1938 年的一些通信，其中甚多涉及日军暴行。

第 59 卷集中收藏 1937—1939 年与南京日本使馆之间的来往信函及附件，以及 1938 年与上海日本总领事馆之间的来往信函及附件，特别是前者大多与揭露、谴责日军暴行有关。

第 63 卷较有价值者，为 1937—1938 年与金陵大学创建者会 (Board of Founders) 之间的信函，1938 年与上海全国基督教会之间的信函，以及 1941 年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的有关信函。

第 65 卷为与《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 (Timperley, H. J.) 之间的通信，其中有若干件特具参考价值。

第 67 卷收有与南京美国大使馆之间的来往信函，时间为 1938—1940 年，其中亦有若干件与南京日军暴行有关。

第 861—871 卷主要是贝德士收藏的各种有关南京沦陷后情况的文献资料，其中以第 863—869 卷价值较高。

第 1137 卷是贝德士认为对自己有纪念意义的杂件，时间为 1921—1948 年。其中有贝德士 1946 年出席东京远东军事法庭作证记录的副本，还有对此次审判的报道，如《另一个纽伦堡》(The Other Nuremberg) 等。

最早肯定贝德士对日军暴行揭露工作的中国人，是当时刚刚卸任的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他在 1938 年 1 月 10 日的日记中有如此记述：“金陵大学美国教授 Bates，曾在首都（指南京——引者）目击去年 12 月 13 日日军入城后，抢劫私家物品，大批枪杀解除武装之我方军士及难民，并搜挟少年妇女于一处而强奸。该教授曾将目击情形，以书面分送各中外人士，但未署名”。其 2 月 14 日日记又称：“今日由汉口渡江赴武昌，赴华中大学之餐约。席间，该校代理校长黄溥，具述留在南京之美国教授 Bates，最近托美国军舰带出之信息。据 B. 氏 1 月 10 日函称，日军入南京后，其

强奸、掳掠与残杀无武器人民惨状，有非外间所能梦想者。（中略）……。（B. 氏函件已由该校给予一份）。”王氏所得到的是贝德士于1938年1月10日托美国军舰带出的信件复印本，其原稿收于《贝德士文献》第52卷。

1991年秋，我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系统检阅《贝德士文献》，并集中力量复印有关南京大屠杀有关文献。美国华人团体“对日索赔会”友人吴章铨闻讯专程来访，并将我搜罗的资料又全部复印一份携去。不久，他寄来旅美台北学者吴相湘函件的复印本。吴先生引用了王世杰日记有关片断，并指出：“由此可知，当时中国政府是由贝德士信件始知南京大屠杀事，故贝德士文件，见得有副本，其重要性可知矣。”吴氏为中国现代史料鉴别专家，其评价自有所据。

如果作进一步考究，我认为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评判《贝德士文献》有关“南京大屠杀”部分的史料价值。

一日原始性

历史档案贵在原始，即所谓第一手（first hand），因为它未经任何更改。南京国际委员会的档案文献，虽然早在1938年已由《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H·J·Timperley），在其所著《战争意味什么？日军在华暴行》（What War Means, The Japanese Terror in China）一书作为附录发表，同时又由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编为《南京安全区文件》（Documents of the Nanking Safety Zone）在1939至1940年期间出版，但由于战争原因都难以原件影印公布于世，难以翔实的背景材料说明其原始性与真实性。特别是田伯烈的书，为了保护文献提供者的人身安全，一般都有意略去其真实姓名，这样也难免或多或少影响其可信度。现在，收藏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贝德士文献》中的南京国际委员会档案，已经公诸于世。这些档案全都保持原来风貌，除有少量遗失或破损外，未经任何更动，堪称日军在南京屠杀暴行的铁证。全

图为日本军国主义辩护的“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者，总是强调要有所谓“同时代的第一手材料”。但他们在这批已成为“南京大屠杀”实录的原始档案面前，纵有何等生花妙笔、如簧巧舌，恐怕也难以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

二曰周全性

从时间而言，田伯烈、徐淑希两书所收南京国际委员会文件只到1938年春季为止，而贝德士所收该会档案则到1940年为止，比田、徐两书多两年有余。从种类而言，田、徐两书主要限于国际委员会由主席或秘书正式签发的公函及其附件，而贝德士文献所收，除国际委员会正式公函外，还有各难民营向国际委员会报告日军暴行的原件，这些原件是国际委员会据以向日本大使馆和军事当局及时通报的原始依据。此外，贝德士还收有南京沦陷期间有关日军烧、杀、淫、掳、贩毒、欺骗宣传的各种文献材料，特别是他与亲友之间的秘密通信，更为坦率而又翔实地揭露日军各种残暴罪行。如贝德士1938年1月10日辗转送出的密函。1938年4月2日为驳斥“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致麦金牧师函，1938年4月12日为说明田伯烈《日军在华暴行》编写背景致友人书，1938年11月29日就日军在南京地区造成战争损害有关统计数字给友人的信，这些信件都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贝德士作为维护正义的外籍人士，除努力揭露日军大屠杀罪行以外，还曾花费许多精力调查研究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地区大肆扩展的毒品贸易（包括鸦片与海洛因），成为掌握此项资料最多的见证人之一。贝德士文献中保存的南京日军慰安所（美其名曰“第四支亲善馆”）海报，上面清清楚楚标明“支那美人”四个大字，这也是很罕见的~~第一~~一手材料。

三曰客观性

贝德士虽然自称为“南京老市民”，但他毕竟是美国人，在1941年以前属于中立国人士。作为专注东方的历史学者，贝德士

对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民都具有深挚的感情，他一直呼吁两国人民应该和平友好相处，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作为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他反对战争但对中日两国并无任何先验的偏见，是亲眼看到的客观事实使他作出公正的价值评判。1938年4月2日他给纽约J.C. 麦金牧师的信中指出：“我注意到您曾致函《（纽约）时报》说，有关日军南京屠杀的故事是虚构的。可能这些时你已经知道它们只能是太千真万确了。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这些事情，我也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代社会。这使人想起古代的亚述暴行。我们未曾料到如此恐怖，当这些事情开始时，对我们是可怕的震撼。”私人之间这样真诚的表露，自然反映了记事的真实可靠。同时，贝德士不仅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行，而且也如实地批评自己国家的政府纵容、支持日本侵华的错误政策。1938年11月29日，他在去马德拉斯参加国际会议途经香港时，曾给友人一封信叙述：“南京城内的美国和平主义者，其生活也是严峻的。他们连续数日目睹成百架（日本）轰炸机群飞过，有些带有美国装备，而且几乎全部灌满美国汽油；在江上连绵的（日本）军舰是用美国汽油驱动的；公路上数以百计的（日本）军用卡车也是通用公司和其他美国厂家制造的。他们在美国的和平主义者友人正受到谴责，为了害怕法西斯国家不高兴。（美国）断然反对通过国际合作走向世界政府蹒跚的第一步，反对取消与侵略者的经济伙伴关系，从而使世界上的弱国横遭蹂躏。”贝德士这种超越狭隘民族主义立场的博大胸怀，更增添了他的历史记载的客观性与公正性。

四曰严谨性

贝德士是经过牛津、耶鲁等名校严格训练的历史学家，而国际委员会大多数公文签发者史迈士（Lewis S. C. Smythe，国际委员会秘书长），则是著名的社会家。经他们整理并正式通报日方的日军罪行案例报告，都经过多次核实，并有可靠的知情者作证

(凡能公开身份者则署姓名,但大多证人则略去姓名以保障其人身安全)。1938年3月至6月,在贝德士的协助下,史迈士主持南京地区战争损失调查,并编辑出版调查报告——《南京地区战争损失,1937年12月—1938年3月》(War Damage in the Nanking Area, December, 1937 to March, 1938, Urban and Rural Surveys)。这是关于南京地区战争损失状况最早也是比较全面的一份调查报告。他们“找到一位富有经验的农业经济专业人员,充当训练调查员和指导制表工作的总管”。还有以前曾为金陵大学卜凯教授大型调查报告——《中国的土地利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制图的人员亦来协助此项工作。由于国际委员会信誉良好,前来应征充当调查员者非常踊跃。除对调查员给以必要方法训练外,还向他们作细致的解释,他们的任务只限于调查事实,不同于家庭救济调查,更不能有意夸大损失。调查对于田野工作程序、资料时间、统计程序、重量单位、面积和币制都有明确的规定,体现了较好的科学规范与严谨作风,不同于某些浮泛的估量或夹杂情绪性的抨击。正如贝德士为这份报告写的序言中所曾指出:“国际委员会注意到,中国人已经发表的有关南京地区人民损害的报道,对日本人往往有排外的夸大的谴责;而那些由日本人发表报道,则把焚烧与抢劫说成是中国人干的,是他们自己大发慈悲加以阻止。”而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公布此项调查结果,完全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首先乃是与本地和其他地区救济工作相关连的信息,其次则是牵涉或将要牵涉任何国家公民的战争损害”。报告所遵循的最高原则就是“客观准确”,而其目的无非是让外在世界了解南京地区的事实真相,并为后世留下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历史实录。对于这样严肃的文献材料,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给以高度重视。

但是无庸讳言,贝德士文献所保存的有关南京大屠杀资料也存在着若干局限性。

一是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是战争环境，加以日军横行霸道，限制极严，国际委员会对日军暴行的直接了解很难超越安全区以外。1938年3月至6月，他们虽然组织人力对南京地区（包括城乡及邻近县）进行覆盖面较大的战争损失调查，然而已是时过境迁人口异动太大，受害家庭或全家死难，或逃避外地，而留居本地的幸存者也难免心存顾虑，不敢畅所欲言。在这样异常的情况下，自然很难获致完整准确的统计数字。

也正是考虑到在战争环境进行社会调查的各种困难，史迈士等决定采取抽样调查的方法，对市内每50个居住房屋调查一个家庭，在农村则是每3个乡村中调查一个乡村，每10个返回农村的家庭中调查一个家庭。这样的调查结果，其意义主要在于说明造成损害的原因（即由于日军暴行所造成），而很难根据这一结果统计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确切总数。

还存在着语言隔阂问题。贝德士、史迈士等国际委员会成员尽管在中国多年，而且粗通中国语言文字，但他们经常接触的是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对一般老百姓（特别是乡村居民）的南京方言并非通晓。他们对于日军罪行的记录仍然习惯于用英文，而受害者姓名与肇事地点的拼音便很难回译为确切的中文原称。在使用这些文献时，必须与其它相关中文资料相互校核。

虽然存在着这些局限性，但南京国际委员会的外籍人士，不顾个人安危得失，在中国最为艰难的岁月里，与日寇蹂躏下的南京人民患难与共，不仅竭尽一切努力救援无依无靠的20多万难民，而且还凭借自己的学者良知与专业训练，对日军在南京地区的滔天罪行日复一日地如实记录并作为力所能及的社会调查，为后世留下数量相当大的宝贵资料。这批资料不仅在东京、南京两次审判日本主要战犯时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也成为我们现今研究日军南京大屠杀问题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

我于1995年春夏之间，利用这批资料先后写成《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和《南京1937年11月—1938年5月》，分别在武汉、香港出版。这两本书在写作期间与出版以后均引起海外新闻媒体的极大兴味，纷纷加以报道评介，认为有助于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美国南伊利诺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日本侵华史研究者吴天威先生、台北金禾出版社社长郭俊铄先生，对于这批文献资料的发掘与利用也非常重视，决定以《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为基础，将贝德士文献中的英文原件影印出版，作为日军暴行的有力证明公诸于世。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对于此事也非常热心，委托长期管理这些资料的斯茉莉女士筹办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与图片展览。展览预期在今年11月开幕，展品除贝德士文献相关资料外，还有该馆保存的南京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如史迈士、费吴生（George A. Fitch）、魏特琳（Minnie Vautrin）、威尔逊（Robert O. Wilson）、麦卡伦（James McCallun）等人的相关文献与照片。我想这些信息将会引起全世界关心南京大屠杀历史事件的善良人们的注意，同时也会使那些千方百计掩盖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极少数日本人为之震撼。

附言：

由于本文材料全部取自拙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所以引文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作者章开沅，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
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

马希曼、拉沙与早期的《圣经》中译

马 敏

国内著述一般以为，近代历史上系统地把西方最重要的典籍《圣经》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土，始自最早来华的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①。最近，笔者在英伦从事短期研究工作期间，十分偶然地在牛津大学的波德林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和安格斯图书馆（Angus Library）阅读到一批早期的中文《圣经》译本，遂又循此线索，到剑桥大学的圣经会图书馆（Bible Society Library）查阅了若干外界难以看到的早期中文《圣经》版本。方知《圣经》中译的历史，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其中，略早于或至少与马礼逊同时进行的马希曼和拉沙的《圣经》中译工作，由于远在印度，便鲜为国人所知，一般中文著述也很少提及^②。因此，本文拟主要利用保存于牛津大学安格斯图书馆的英国浸礼会档案中有关马希曼

① 有关国内著述，可参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1991年版）第24页；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② 简又文编撰的《中国基督教的开山事业》（基督教辅侨出版社，1956年版）第11页对马希曼和拉沙的《圣经》翻译略有提及。王治心著《中国基督教史纲》（文海出版社重印本，1966年版）第147页对此也略有提及，但均语焉不详。惟香港学者李志刚博士所著《基督教早期在华传教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除在该书第162页对马希曼的《圣经》中译略有介绍外，第177—178页注20对马希曼的生平有比较详细的介绍。